

专题之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的 创 建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兴起。共产国际在世界革命高潮形势下成立。中俄交通的打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使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阐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此后共产国际又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民主革命纲领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共产国际成立和维经斯基使华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其世界革命战略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俄国革命使帝国主义的所有矛盾尖锐化了，并使世界工人在其反对暴力压迫制度的斗争中得到鼓舞。俄国革命的胜利，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革命斗争，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

俄国革命首先影响和推动了欧洲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1918年1月，在奥匈、德国就爆发了200万工人举行的

罢工和抗议活动。1月底，芬兰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芬兰是继苏俄之后建立工农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家。1918年9月，保加利亚军队中爆发了武装起义，士兵们宣告推翻王朝，并宣布共和国成立。11月，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工人和士兵接管了柏林，并推翻了德皇统治。此外，在东欧的捷克、南斯拉夫、波兰、乌克兰等国，西欧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掀起革命运动。

世界革命运动，特别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国际主义者组织和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各国共产党和小组的进程。1918年下半年，芬兰、奥地利、荷兰、匈牙利、德国等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1918~1919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瑞典、挪威、希腊、瑞士、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团体。

世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及团体的形成，是共产国际成立的一个最重要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机会主义领袖们纷纷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背叛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因而也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世界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同时，国际帝国主义正联合起来共同排斥苏俄，反对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进而企图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很快建立一个革命的国际来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社会主义

国家的建立又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是列宁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继续。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久，列宁就认为第二国际已经死去，并开始了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1914年1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声明，最早提出建立新国际的任务。1915年9月在瑞士齐美瓦尔德召开的第一次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被列宁称之为“走向第三国际的第一步”^①。1916年4月，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第二次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列宁向会议阐明了组织第三国际的基本主张。这就使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更进了一步。1918年12月24日，列宁领导的俄共（布）中央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成立第三国际的建议。1919年1月24日，以列宁领导的俄共（布）为代表的8个共产党组织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出了成立第三国际的邀请书。3月2日至6日，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出席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有53人，代表欧、亚和北美等21个国家的30多个政党和左派组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列宁被选为常务主席，并自始至终主持了大会的工作。列宁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已经破灭。”又指出：“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②列

^①《列宁文稿》第6卷，第230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715页。

宁强调，“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经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大会通过了俄共(布)中央负责起草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大会完全接受列宁提出的以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作为共产国际纲领的基本原则。大会规定的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即“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②。

大会最后选举和决定了7名欧洲各国的代表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俄国共产党代表季诺维也夫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国代表巴拉巴诺娃和沃罗夫斯基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或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无论从内容到组织都注重于欧洲革命。虽然东方国家也有代表参加会议，但会议没有对东方革命进行具体讨论，也没有东方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这一情况，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范围所决定的。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虽然由于中俄交通的阻隔，没能有中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810页。

②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94页。

国国内的革命者参加，但大会却邀请了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参加了会议。刘绍周在会上还作了专门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地祝贺。”^①列宁在会议期间还亲切接见了刘绍周和张永奎，询问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情况。

（二）共产国际成立前后的中俄形势和维经斯基使华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西伯利亚地区的高尔察克、谢米诺夫和霍伐斯三股沙俄白匪蜂起。四、五万捷克人（奥军俘虏）站在白匪一边。紧接着，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纷纷出兵干涉西伯利亚。他们支持白匪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11月，在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支持下，高尔察克夺取了鄂木斯克的苏维埃政权，成为西伯利亚白色政权的最高统治者。

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曾经很快出现在东方。1917年12月，守卫中东铁路的俄国军队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驱逐了沙俄驻中东铁路的督办霍伐斯。但张作霖部下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镇压了这一革命。1918年1月，中国北京政府下令封闭了中俄国境，关闭了中俄交通，以防止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18年8月，中国北京政府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段祺瑞等又联合签名发表了《海参崴出兵宣言》，加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中国出兵是象征性的，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它主要是进占中东铁路和封锁中俄国境。

上述情况表明，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共产国际成立时，西伯利亚地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曾遭受严重挫折，苏维埃政权的影响范围只限于俄国的欧洲部分；由于中国军阀政府极力反对俄国革命，封闭中俄交通，使得中国人民无法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绝无可能接纳中国革命党的情况下，苏俄政府只能邀请旅居俄国的华工联合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这样，共产国际成立后，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实际上仍处于隔绝的状态之中。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虽然成立，中国人民却很少有人知道。

共产国际成立后，中俄形势很快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支持俄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西伯利亚的口号，但这一运动却打击了干涉西伯利亚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的中国军阀政府，从而极大地支持和声援了苏俄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正集中精力于领导欧洲革命。但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关注。后来，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之所以作出派人访问中国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的决策，就是因为共产国际“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

的大革命运动”①。

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军西伯利亚。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指出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进发，其目的不但要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宣言宣布废除中俄间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铁路。宣言旨在要求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采取同情和支持苏俄政府的行动。但是，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对苏俄政府的宣言却不予理会。1919年底和1920年初，西伯利亚形势急转直下，1919年10月，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的政权垮台。接着，日、美两国干涉军发生冲突。四、五万捷克人要求遣返。1920年2月7日，高尔察克及其同伙在伊尔库茨克被处决。与此同时，美英法干涉军纷纷撤退。日本干涉军也返回滨海省和库页岛。至此，帝国主义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便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中国军阀政府封锁中俄交通的政策也随之宣告破产。1920年3、4月间，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公开发表，北京政府派代表同苏俄使者接触。中俄交通随之打开。

中俄交通的打开，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建立联系创造了条件。早在1920年1月，在海参崴的地下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领导人库什那列约夫和萨克赫扬诺娃就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说他们坚决要同中国革命建立经常的联系。不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决定派以维经斯基为首的

①李达：《七一回忆》，载《七一》创刊号1958年7月1日。

俄共（布）小组到中国，建立同中国革命的联系。1920年3月，维经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马迈耶夫夫妇、波林以及翻译旅俄华人杨明斋等从海参崴来到了北京。

这时，维经斯基虽然还不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到中国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但他的来华是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后来，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成立了，他便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这样，维经斯基就成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便是由他始建起来的。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与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努力向俄国学习，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最早表示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并期望建立两国革命的联系。1918年初，孙中山就认为，中、俄两国革命党可以互相支援，“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①。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人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改除专横之王家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亦然。”^②这就明确表示要向俄国革命学习。1918年夏，孙中山又在上海设法通过许多中间媒介送给列宁一封信，热烈祝贺俄国革命

^①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载《建国月刊》1935年第6期。

^②《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孙中山在信中明确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因此，“中国革命党和俄国革命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斗争”^①。列宁收到信后非常感动，他把这封信看作是“东方的曙光”。为了回答孙中山的来信，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复函孙中山，也提议双方联合起来，建立两国无产阶级的联盟。但这封信没有送到孙中山手中，双方未能建立联系。

李大钊是中国重视俄国革命动向和极其赞助俄国革命的先进分子的代表。早在1917年4、5月间，他就著文歌颂二月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又著文指出：“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要“翘首以迎世界文明之曙光”。1919年2月，李大钊又著文说：“由乌拉尔山至亚尔布土山。其间的城市，大半成了社会主义根据。……但是这种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一隅，……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共产国际建立后，李大钊又最早撰文表示支持，他在文中说：“为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又说，“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由于李大钊极力赞助俄国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以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对俄国革命的赞颂和支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奠定了基础。

^①叶尔马舍夫：《孙逸仙》，莫斯科1964年版，第211页。

（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维经斯基等人到北京后，经过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柏烈伟的介绍，首先会见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等活动，邀请北京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国际使者座谈，以增进交往。李大钊还同维经斯基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多次座谈，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深感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同时也坚定了创建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心。当时，“维经斯基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刊物、《震撼世界的十天》等。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讲了军事共产主义等。尔后，又找个别人谈话”^①。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上海会见另一位五四运动最著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

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之地，而且聚集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的宣传家。1920年4月，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小组除留马迈耶夫夫妇在北京帮助李大钊建党外，其余全部赴上海。维经斯基一行抵达上海时，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陈独秀这时不尚空谈，正在努力为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进行着切实的工作。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陈独秀领导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上海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意义是深

^①罗章龙：《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一大”前后》（二）。

远的。陈独秀1920年初从北京赴上海时，就同李大钊一起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建党意图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维经斯基根据他在北京和上海的所闻所见，并依据苏俄革命经验，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他还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因此，他建议陈独秀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正符合陈独秀的心愿。他决定立即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很快同上海各派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们以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参加这些座谈讨论的是各派社会主义团体的重要人物，其中有：陈独秀（发起者）、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维经斯基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处于混乱状态；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①于是他提出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正如陈望道回忆所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

^①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载《古今》半月刊第19期，1943年3月。

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①但是，张东荪和戴季陶等却不赞成，他们只参加过一两次酝酿建立党组织的座谈会就借口退出了。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和刘大白等参加活动不久也退出了。只有陈独秀等决心在共产国际使者的帮助下组织共产党。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7月初，负责选派维经斯基小组使华的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负责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会议，会上指明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②。7月中旬，在维经斯基及其小组成员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佩尔林等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国积极分子”会议。随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就正式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建的过程中，陈独秀又给北京的李大钊和张申府等写信，讨论建党问题。同时商定由陈独秀负责南方的建党工作，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这就是“南陈北李”的由来。此后，在共产国际使者的帮助下，李大钊在北方负责推动了北京和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则推动了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维经斯基小组成员马迈耶夫夫妇先在北京帮助李大钊等从事建党工作，后又到武汉帮助那里的建党工作，1920年秋，维经斯基又派小组成员斯托扬诺维奇和波林赴广州帮助

^①陈望道回忆，载《“一大”前后》（二）。

^②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略》，载《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

建立共产党组织。但是，斯托扬诺维奇和波林到广州后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联系，创建了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组织。同年冬，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赴广州后，又亲自改组了由斯托扬诺维奇和波林帮助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组织，组成了有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等人参加的广州共产党组织。此后，维经斯基自广州经上海、北京回伊尔库茨克，陈独秀则根据维经斯基和陈炯明商谈的条件，在广州任陈炯明控制的广州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暂时放弃了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建党工作。维经斯基在离开北京回国之前，又再次会见李大钊，并和北京党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座谈。他在座谈中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共产党组织能够迅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维经斯基回国后，立即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远东书记处的任务是调查远东情况，联系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国开展革命运动。所以，维经斯基回国后，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仍很密切。为加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维经斯基把张太雷介绍到共产国际去工作。1921年3月，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很快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建立了联系，并很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科长。在一份《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和远东书记处立共产国际远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

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报告还说，在一次会上，张太雷提出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1）“以关照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2）由两个书记负责这个支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任此工作的代表，另一个代表由远东书记处派出。（3）按照常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成为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组织联系的原则，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全体成员，应由驻远东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各地区代表组成。这个支部属于远东书记处①。1921年6月，张太雷又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张太雷还被获准在大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极力号召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给予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持②。张太雷赴俄促进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建立，得到了维经斯基小组的帮助和支持。这批共产国际使者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创建，而且通过帮助和支持中国共产

① 尤金·诺思：《苏俄与东方，1920—1927》，斯坦福大学1957年英文版，第139—140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党各地组织创办革命刊物，建立活动学社，组织工人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1921年上半年，维经斯基虽然回国，但由他推动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则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

二、马林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反映了欧洲革命的退潮和东方革命的兴起。大会围绕列宁起草和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加强民族和殖民地工作，大会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制定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正确理论、战略方针、路线和政策。列宁还亲自指定印度人罗易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制定工作。列宁还向大会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列宁在大会所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阐述的基本思想是①：

第一，阐明当代世界已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贯穿整个提纲的基本思想，是共产党人考察和解决民族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版，第15—54页。

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阐明这一点，就是为了进一步揭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否认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别，掩饰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否认帝国主义同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人民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

第二，提出必须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说：这是“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

第三，提出无产阶级在殖民地革命斗争中的战略策略。这就是：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第一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因此，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就应该同他们结成联盟。但是在同他们结成联盟时，不能同他们融合在一起，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只说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当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或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而没有明确阐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列宁却指出了：“落后国家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同时，大会通过的由墨西哥代表团负责人、印度人罗易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却阐述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在东方殖民地革命中将起重要作用以至领导作用的观点。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族和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战略策略的理论根据，也是后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

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时，虽然中俄交通已经打开，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以维经斯基为首的俄共(布)小组已抵达中国并积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但是，中国国内仍没能派出革命党的代表出席这次共产国际的会议。因此，仍然是刘绍周和安恩学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从刘绍周的发言可知，他还不了解维经斯基小组正在中国帮助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刘绍周在发言中重点论述的是孙中山如何领导和影响南方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的情况。刘绍周在发言中要求共产国际注意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说“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①。

在这次大会上，荷兰共产党人马林也参加了列宁领导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马林早在1914年就到爪哇帮助建立了革命党组织。1920年夏，马林以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马林的发言旨在号召共产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支持东方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他建议将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提纲“以几种东方语言发表，并专门散发给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他还建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并希望“东方的革命者能在俄国受到理论教育，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积极成员”^②。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4页。

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0页。